

中央民族大学国家「十一五」[211工程]建设项目

◎ 奇文瑛 / 主编

第十一辑

民族史研究

**Ethnic
History
Studies**

Series 11

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
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

中央民族大学国家“十一五”“211 工程”建设项目

民族史研究

第 11 辑（总第 12 辑）

奇文瑛/主编

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民族史研究·第十一辑/奇文瑛主编. —北京: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, 2014. 2

ISBN 978 - 7 - 5660 - 0649 - 3

I. ①民… II. ①奇… III. ①中华民族—民族历史—文集
IV. ①K28 - 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03790 号

民族史研究·第十一辑

主 编 奇文瑛

责任编辑 黄修义

封面设计 布拉格

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

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: 100081

电话: 68472815 (发行部) 传真: 68932751 (发行部)

68932218 (总编室) 68932447 (办公室)

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 厂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 × 1230 (毫米) 1/32 印张: 14.5

字 数 378 千字

版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660 - 0649 - 3

定 价 46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 录

历史与考证

- 古史新证与宋襄公泓之战 李慧强 (1)
- “和亲”辨义
- 对“和亲”即政治联姻传统观念的质疑
- 刘兴成 (14)
- 十六国北朝政权的骑兵建设与运用 李硕、蒋爱花 (39)
- 唐与吐蕃松州之战始末 杨思奇 (56)
- 后蜀孟氏婚姻研究
- 兼论家族史视野下的民族融合 胡耀飞 (75)
- 元代蒙古、色目人荫叙三题 于 洁 (101)
- 从地域认同的角度看明代“辽东隶于山东”
- 现象的演变 陈晓珊 (127)
- 李春芳与“俺答封贡” 马静茹 (144)
- 《明史纪事本末》勘误五则 韩慧玲 (153)
- 明代西北土官非土司考释——从“土司”
- 一词的产生分析 陈文俊 (162)
- 哈达哈事迹述略 刘金德 (195)
- 乾隆朝对天山南北地区的测绘活动 阿音娜 (213)

· 2 · 民族史研究

- 《热河日记》与清代民族问题研究二题 王桂东 (224)
- 清末川军入藏缘由浅析 文厚泓 (248)
- 中泰朝贡的终局 [泰国] 黄璧蕴 (261)
- 清政府规范与管理下的陆军贵胄学堂 冯月然 (278)
- 宗教改革与民族国家的形成
——以伊丽莎白时代的英格兰为例 郭伟全 (298)
- 试论欧盟政治联合中的民族认同问题 梁 旭 (317)

考古与调查

- 先秦时期銮铃的形制分析与分期 任昞霏 (332)
- 纸坊头一号墓墓主身份再分析 张利芳 (351)
- 武陵地区散杂居蒙古族的分布及来源 王希辉 (368)

翻译与书评

《华阳国志》中的非汉民族和民族

- 官印 [日] 谷口房男著 李德龙、李云霄译 (383)
- 中原蒙古人的汉化 ... [美] 亨利·赛瑞斯著 王伏牛译 (402)
- 明清时期壮族土官对汉文化的
接受 [日] 塚田诚之著 陈巍译 (418)
- 读《成吉思汗与当今日世界之形成》 潘瑞国 (435)
- 路康乐著作《满与汉：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
政治权力（1861—1928）》评介
——兼论晚清满汉关系史研究 王 宇 (444)

古史新证与宋襄公泓之战^①

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李慧强

《左传·僖二十二年》“大司马固谏”杜预注“大司马固，庄公之孙公孙固也”^②，前人对此一直存在较大争议，问题虽小，但从清代至近代以来学术界都较为关注，虽有学者做过相关论述，但未详述理由，^③因此至今仍未有定论。对这一问题进行梳理，不仅能为学术上久悬未置的争议提供新的论证，对认识宋襄公泓之战的相关史实也有帮助。本文不揣浅陋，谨以马王堆汉墓出土的《春秋事语》等材料做一简析，以求教于方家。

① 本文为教育部“博士生学术新人奖”支持项目（教育部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文件，教研函〔2011〕5）。

② 李学勤主编：《十三经注疏·春秋左传正义·杜预注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1999年，第403页。

③ 刘家和：《史学、经学与思想：在世界史背景下对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思考》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05年，第277—278页；仇振中：《谈〈子鱼论战〉中的“大司马固谏”》，《山东师范大学学报》1978年第6期，第52、第66页；阎丰古、刘学敏：《也谈〈子鱼论战〉中的“大司马固谏”——同仇振中同志商榷》，《山东师范大学学报》1979年第1期，第46、第78—79页；周维纲：《〈左传〉“大司马固谏”杜注质疑》，《社会科学战线》1995年第4期，第36页。

一、《左传》、《史记》的记载及前人研究

据《左传·僖二十二年》载：

楚人伐宋以救郑。宋公将战，大司马固谏曰：“天之弃商久矣，君将兴之，弗可赦也已。”弗听。冬，十一月，己巳，朔，宋公及楚人战于泓。宋人既成列，楚人未既济。司马曰：“彼众我寡，及其未既济也，请击之。”公曰：“不可。”既济而未成列，又以告……国人皆咎公。公曰：“君子不重伤，不禽二毛。古之为军也，不以阻隘也。寡人虽亡国之馀，不鼓不成列。”子鱼曰：“君未知战，勍敌之人隘而不列，天赞我也。阻而鼓之，不亦可乎？犹有惧焉。且今之勍者，皆吾敌也，虽及胡耆，获则取之，何有于二毛？明耻教战，求杀敌也。伤未及死，如何勿重？若爱重伤，则如勿伤；爱其二毛，则如服焉。三军以利用也，金鼓以声气也。利而用之，阻隘可也，声盛致志，鼓儆可也。”^①

上述共出现“大司马”、“司马”、“子鱼”三个称谓。从《史记·宋微子世家》来看，则全为子鱼，即公子目夷一人：

十二年春，宋襄公为鹿上之盟，以求诸侯于楚，楚人许之。公子目夷谏曰：“小国争盟，祸也。”不听。秋，诸侯会宋公盟于孟。目夷曰：“祸其在此乎？君欲已甚，何以堪之！”于是楚执宋襄公以伐宋。冬，会于亳，以释宋公。子鱼曰：“祸犹未也。”十三年夏，宋伐郑。子鱼曰：“祸在此矣。”秋，楚伐宋以

^① 李学勤主编：《十三经注疏·春秋左传正义》，第403—405页。

救郑。襄公将战，子鱼谏曰：“天之弃商久矣，不可。”冬，十一月，襄公与楚成王战于泓。楚人未济，目夷曰：“彼众我寡，及其未济击之。”公不听。已济未陈，又曰：“可击。”公曰：“待其已陈。”陈成，宋人击之。宋师大败，襄公伤股。国人皆怨公。公曰：“君子不困人于厄，不鼓不成列。”子鱼曰：“兵以胜为功，何常言与！必如公言，即奴事之耳，又何战为？”^①

显然，司马迁认为“大司马”、“司马”皆为“子鱼”一人，其后司马迁也记载了公孙固的相关事迹，“十七年，成公卒。成公弟御杀太子及大司马公孙固而自立为君。宋人共杀君御而立成公少子杵臼，是为昭公”^②。这说明司马迁在撰写《史记》时，知道大司马公孙固的存在，并且在宋国政治格局中居于重要地位。

前人对此的研究，自清儒以来就有争议，其观点大致可分为“杜注非说”和“杜注正说”两种，代表人物分别是顾炎武和惠栋。顾炎武是经学大师，他以《左传》行文司马与大司马区分不严及《史记》所言为据否定杜注：

大司马即司马子鱼也。固谏，坚辞以谏也。隐三年言召大司马孔父而属殇公焉，桓二年言孔父嘉为司马，知大司马即司马也……定十年公若藐固谏，知固谏之为坚辞以谏也。杜以固为名，谓庄公之孙公孙固者，非。朱鹤龄曰：按《史记·宋世家》则前后俱子鱼之言。^③

① 《史记》卷38《宋微子世家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2年，第1326页。

② 《史记·宋微子世家》，第1327—1328页。

③ [清]顾炎武：《左传杜解补正》，台北：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，2008年，第一七四册经部一六八，纪昀、永瑢等：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174册，第6—9页。

惠栋自其曾祖父起已四世研究《左传》，无疑也是大师，但却力主杜注为正：

《晋语》云“公子过宋与司马公孙固相善”，韦昭曰：“固，宋庄公之孙，大司马固也。”公子过宋适当襄公之时，韦、杜皆据《世本》而言，称大司马，所以别下司马也。顾氏不见《世本》而曲为之说，失之。《史记》疏略，不足取证。^①

惠栋引《晋语四》与《世本》文，确证顾氏之非。沈钦韩亦有与惠氏相同之说。^②

关于上述争论，杨伯峻先生曾有过相关总结：

《宋世家正义》引《世本》曰：“宋庄公孙名固，为大司马。”又据《晋语四》，公孙固之为大司马，正在此时，详二十三年《传注》，则此大司马必公孙固也。僖十九年传有“司马子鱼”，司马即大司马，详后《注》。是则此时子鱼已不为司马矣。《宋世家》以此为子鱼之言，顾炎武《补正》力主之，恐未确，说参惠栋及沈钦韩《补注》。《韩非子·外储说左上》作“右司马购强”，“购强”即“固”之缓读。固为鱼部字，强为阳部字，古音可通。卢文弨以购强为固之字，可商。参卢文弨《钟山札记》及梁玉绳《史记志疑》。^③

① [清] 惠栋：《春秋左传补注》，纪昀、永瑆等：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18册，第6—9页。

② [清] 沈钦韩：《春秋左氏传地名补注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年，顾廷龙：《续修四库全书·一二五·经部·春秋类》，第32页。

③ 杨伯峻：《春秋左传注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9年，第396页。

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，仇振中等学者先后对杜预注进行商榷式探讨，实际因循清儒的研究线路，从材料到观点并无过多突破，基本可纳入上述两种观点之列。^①

总之，《左传》认为“大司马固”或“司马”和“子鱼”为多人，司马迁则认为“大司马”、“司马”皆为“子鱼”一人。而前人的研究可总结为对“大司马固谏”杜预注一直存在较大争议，其焦点在“固”当作人名还是副词解释，以及“司马”和“大司马”是否同一职官，“司马”所指为谁等。

二、从《春秋事语》等再看《左传》 “大司马固谏”杜注

若根据前人研究，“司马”为“大司马”略写，两者实为一，则又陷入循环论证，本文也失去再探讨的意义。暂时抛开这个问题，另辟蹊径，譬如结合相关材料及研究成果，从“司马”入手反推“大司马”，若“司马”确定，则“司马”是“公孙固”还是“子鱼”等问题亦可迎刃而解。首先，我们假定“司马”和“大司马”非同一职官。的确有学者认为春秋时宋国重要官职一般皆设复职，即宋国区分大司马及司马；^② 其次再判断两“司马”是否同指一人；然后再推定两“司马”所指为谁；

① 仇振中：《谈〈子鱼论战〉中的“大司马固谏”》，《山东师范大学学报》1978 年第 6 期，第 66、第 52 页；阎丰古、刘学敏：《也谈〈子鱼论战〉中的“大司马固谏”——同仇振中同志商榷》，《山东师范大学学报》1979 年第 1 期，第 78—79、第 46 页；周维纲：《〈左传〉“大司马固谏”杜注质疑》，《社会科学战线》1995 年第 4 期，第 36 页。

② 郝铁川、赵长征：《春秋宋国官制初探》，《商丘师专学报》（社会科学版）1985 年第 2 期；另见赵晓斌：《春秋官制研究——以宗法礼治社会为背景》，博士学位论文，浙江大学人文学院，2009 年，第 335—338 页。

最后推定“大司马”的问题。

据《春秋事语》一三《宋荆战泓水之上章》载：

宋荆战泓（泓）水之上，宋人□□陈（阵）矣，荆人未济。宋司马请曰：“宋人寡而荆人众，及未济，击之，可破也。”宋君曰：“吾闻[之]，君子不击不成之列，不童（重）伤，不禽（擒）二毛。”士匭为鲁君橐（犒）师，曰：“宋必败。吾败之，兵□三用，不当名则不克。邦治适（敌）乱，兵之所（迹）也。小邦□大邦，邪以务（攘）之，兵之所□也。诸侯失礼，天子诛之，兵□□□也。故□□□□□□□于百姓，上下无却然后可以济。伐，深入多杀者为上，所以除害也。今宋用兵而不□，见间而弗从，非德伐回，陈（阵）何为。且宋君不亻耳（耻）不全宋人之腹豕（颈），而亻耳（耻）不全荆陈（阵）之义，逆矣。以逆使民，其何以济之。”战而宋人果大败。^①

综观全章，除“宋司马”外，并无“司马”或“子鱼”、“公子目夷”之类的称谓，这和前述《左传》、《史记》不同，尤其“士匭为鲁君橐（犒）师”以下内容，不见于以往文献。这说明《春秋事语》此章的材料来源和《左传》、《史记》等传世文献均不相同。

那么，通过上述能否说明前人对“公孙固”中“固”字用法的激烈争论，实际在《春秋事语》记载者那里并不存在呢？显然不能。其一《左传》中的“大司马”在《春秋事语》中没有相应的对应；其二《春秋事语》中的“宋司马”则基本可对应《左传》中的“司马”。

^①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：《马王堆汉墓帛书》（三），《春秋事语》13《宋荆战泓水之上章》，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83年，第17页。

从《春秋事语》“宋司马”的谏词“宋人寡而荆人众，及未济，击之，可破也”来看，基本符合前述《左传·僖二十二年》司马之言：“彼众我寡，及其未既济也，请击之。”只是前者宋襄公的回答是“吾闻[之]，君子不击不成之列，不童（重）伤，不禽（擒）二毛。”后者则是“不可”，而宋襄公此句，实则对应泓之战后的回答：“君子不重伤，不禽二毛。古之为军也，不以阻隘也。寡人虽亡国之余，不鼓不成列”，换言之，尽管宋襄公的话在《左传》中前后颠倒，但“司马”之言却在两种文献中基本相符，由此大致可认定两“司马”同指一人。

那么，两“司马”所指为谁？据《尹文子·大道上》载：

宋公以楚人战于泓，公子目夷曰：“楚众我寡，请其未悉济而击之。”宋公曰：“不可，吾闻不鼓不成列。寡人虽亡国之余，不敢行也。”战败，楚人执宋公。齐人弑襄公立公孙无知。^①

《尹文子》被学术界认定为先秦古籍，并非伪书，只是或多或少存在后人补入的成分。^②从此处看，“战败，楚人执宋公”，这和《左传》的记载不同，楚人执宋公当在泓之战前，纵观《尹文子》全篇，语录与故事混杂，各段自成起讫，是其基本特点之一。这些姑且不论，从“公子目夷”之言来看，《左传》和《史记》中的两“司马”所言内容则基本相同，换言之，根据《尹文子·大道上》等记载，可推定“司马”指“公子目夷”，即子鱼。

① 《尹文子·大道上》第八五〇册子部一五六，纪昀、永瑤等：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850册，第188页。

② 蔡先金、王玉泉：《〈尹文子〉文本之解读》，《山东社会科学》2007年第12期，第100—104页。

如此，若认定两“司马”同指一人，且为“公子目夷”的话，再看“大司马固”杜注的问题，基本就和杨伯峻等前贤的研究对应成功，即通过上述梳理与分析之后，我们将“司马”和“大司马”区分为两人，前者对应“公子目夷”，后者则为“公孙固”。

反之，若据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和杨伯峻先生等的意见，“大司马为公孙固”，“司马”非子鱼，则又是另一番境况。

据《春秋事语》一三《宋荆战泓水之上章》整理者对“宋司马”的解释：

《左传》作“大司马固”。按《国语·晋语四》：“公子（重耳）过宋，与司马公孙固相善。韦昭注：“固，宋庄公之孙大司马固也。”后来宋成公时，公孙固是宋国执政。《穀梁传》作“司马子反”，当有误字。《韩非子·外储说左上》作“右司马购”，固购音近。《史记·宋世家》误作目夷。^①

此处和杨伯峻先生等前述分析略同，均认为据《晋语四》载公孙固正在此时为大司马，因此，是司马迁将“公孙固”误作“目夷”，此说为确。再补充一点，司马迁对此时公孙固为大司马实也表示赞同，“是年，晋公子重耳过宋，襄公以伤于楚，欲得晋援，厚礼重耳以马二十乘”^②。

可是《春秋事语》整理者认为此时“公子目夷时官左师，不官司马”^③。杨先生等人也认为“司马即大司马”，理由在“是

① 《春秋事语》13《宋荆战泓水之上章》，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83年，第17页。

② 《史记》卷38《宋微子世家》，第1627页。

③ 《春秋事语》13《宋荆战泓水之上章》，第17页。

则此时子鱼已不为司马矣”，此说尤其值得商榷。关于子鱼为“左师”的记载，见于《左传·僖九年》：“宋襄公即位，以公子目夷为仁，使为左师以听政，于是宋治。故鱼氏世为左师。”^①此“鱼氏世为左师”非实指，而见于传者，除目夷外，仅公孙友（目夷子）和鱼石两人，且多在春秋前中期。春秋后期，向氏、仲氏亦曾为左师，^②因此此言不完全准确。事实上《左传·僖十九年》即有“司马子鱼”^③的记载，亦恰好说明子鱼时为“司马”，从僖公十九年（公元前641年）到僖公二十二年（公元前638年），仅三年，“泓之战迫在眉睫，宋襄公焉能轻易免去子鱼司马之职？”^④

如前，关于这一点杨伯峻先生实际也已经注意到，但不知何故却轻易忽略了。实际并无材料证明杨先生关于子鱼此时“不为司马”的判断，即或宋襄公临时替换司马，于一般情理亦不通。《春秋事语》整理者认为子鱼此时“不官司马”的理由亦然。据前述分析来看，“大司马”和“司马”实为两人。杨先生等认为“大司马”即“司马”，看似问题不大，实则把子鱼又重新归为“大司马”公孙固，可谓差之毫厘，谬之远矣。

综上，就目前所见材料而言，“大司马固谏”中的“固”即大司马公孙固，“司马”则为子鱼，即公子目夷，杜注是正确的。^⑤“大司马”非“司马”，两者不是同一职官。顾炎武等人错误否定了杜注，惠栋等人力主杜注为正，驳顾氏之说为确。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和杨伯峻等虽对此进行正确区分，却轻易推

① 李学勤主编：《十三经注疏·春秋左传正义》，第361页。

② 赵晓斌：《春秋官制研究——以宗法礼治社会为背景》，第335页。

③ 李学勤主编：《十三经注疏·春秋左传正义》，第394页。

④ 周维纲：《〈左传〉“大司马固谏”杜注质疑》，《社会科学战线》1995年第4期，第36页。

⑤ 李学勤主编：《十三经注疏·春秋左传正义》，第403页。

测子鱼不任司马，实际又混淆了“大司马”和“司马”之别。而《史记》认为“大司马”、“司马”皆视为子鱼一人显然是错误的，《左传》的记载则相对真实可信。

三、从大司马即公孙固的考证看宋襄公泓之战

在基本梳理清楚“大司马”即公孙固，“司马”为子鱼后，由此再去理解泓之战及宋襄公的心理，将会有新的启示。宋襄公在历史上是一位复杂的人物，前人对此的研究较为丰富且深入，概括起来，共有贬之、褒之，贬褒皆有之三种情况。

贬者自战国即有，至汉代始盛。据《淮南子·汜论训》载：“古之伐国，不杀黄口，不获二毛，于古为义，于今为笑。”^① 传统上认为宋襄公墨守成规，身死人手为天下笑。这种观点目前仍占据当代学术及大众思维的主流，“宋襄公对敌人讲仁义道德，一再贻误战机，结果让敌人掌握了战争主动权，打败了自己的军队，连他的性命也断送了。真是蠢猪式的仁义道德！”^② 近世疑古大将童书业先生实际也参与了对宋襄公的讥讽。^③

而褒者自司马迁始：“襄公既败于泓，而君子或以为多，伤中国阙礼义，褒之也，宋襄之有礼让也”，^④ 但这里太史公似乎更多是基于自身的不幸，而天然产生对失败者的怜悯之情，虽褒其“有礼”，并未说到宋襄公优势的深处，《公羊传》、《吴越春

① 陈广忠译注：《淮南子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12年，第729页。

② 何清谷：《毛主席著作中的成语历史故事》，《陕西师范大学学报》1979年第1期，第90页；杨钊：《宋襄公述评》，《史学月刊》1990年第6期，第21—22，第70页。

③ 童书业：《春秋史》，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2010年，第172—178页。

④ 《史记》卷38《宋微子世家》，第1633页。

秋》甚至《白虎通》推崇宋襄公为春秋五霸之一,^① 这些对赞美同样并不出司马迁之佐。实际“从汉代经学到清代经学,对宋襄公的评价表面上看变化很大,从赞其有德转变为斥其伪善,但是有一点没有改变,就是注重道义轻视谋略”^②。

近代以来对宋襄公的研究也在转向,不再是原来简单的二元分类法,而是看到宋襄公悲剧收场的另一面,^③ 有学者从春秋时期战争观念作战方式等角度考察宋襄公泓之战,^④ 亦有学者透过泓之战的背景看出春秋初年复杂的历史变局,诸如齐桓公以后霸政兴起,华夷对峙的局面以及殷人的复兴运动等。^⑤ 这些重客观因素的研究,和以往仅关注宋襄公个人品行的探讨有很大不同。

不过前人似乎一直有意忽视或弱化了一点,即“宋襄公的霸业以及《左传·僖二十四年》中‘宋,先代之后也,于周为客,天子有事膺焉,有丧拜焉,丰厚可也’和《左传·昭二十五年》中‘我不输粟,我于周为客’等多处强硬外交语言,无不彰显着宋一直未放弃与周王室分庭抗礼的态度”^⑥。其实宋襄公这份

① 《白虎通义·号篇》第八四八册子部一五四,纪昀、永瑤等: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848册,第6—9页。

② 颜世安:《华夷之夷与春秋泓之战》,《南京工业大学学报》2004年第3期,第83页。

③ 黄朴民:《宋襄公与孙武子》,《光明日报》,2002年1月15日第3版;周兴:《重评宋襄公》,《辽宁师范大学学报》1992年第4期,第67—72页。

④ 王长民:《从宋襄公泓之战看春秋时期战争方式的转变》,《枣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》2004年第6期,第43—45页;黄朴民:《从“以礼为固”到“兵以诈立”——对春秋时期战争观念与作战方式的考察》,《学术月刊》2003年第12期,第82—90页。

⑤ 颜世安:《华夷之夷与春秋泓之战》,《南京工业大学学报》2004年第3期,第68—73,第83页。

⑥ 子居:《先秦文献分期分域研究之一虚词篇》,《学灯》第17期,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简帛研究网站, <http://www.jianbo.org/admin3/2011/xuedeng017/zi-ju.htm>, 2011年1月1日。

心思，连外人鲁臧文仲也看得清楚，据《左传·僖二十年》载：“宋襄公欲合诸侯，臧文仲闻之，曰：‘以欲从人则可；以人从欲鲜济。’”^①

通过上述对大的历史背景回顾，尤其是泓之战中“大司马”公孙固和“司马”子鱼的言行，对宋襄公当时处境及其心理会有不同的理解与体会。假若进谏“天之弃商久矣，君将兴之，弗可赦也已”等言之人，如《史记·宋微子世家》所言皆为子鱼，那宋襄公在听子鱼谏和公孙固的反应与感受将会有所不同。

公孙固和子鱼虽同为宋国宗室及重臣，但子鱼向来频频进谏，宋襄公或许闻之多矣，即使在泓之战前，子鱼再谏亦无非再多听一次，但“天之弃商久矣，君将兴之，弗可赦也已”，突然出自此前寡言的公孙固之口，且第一句即直指宋襄公的心结“天之弃商久矣”，是“天”之弃“商”（注意：是“商”，不是“宋”），而不是我们力量不够，那就再无他法。

或许当时公孙固诸多言行并未记录下来，但由此或可想见当时宋襄公处境之艰难，既众叛亲离，无一人支持，连“天”也要弃之。公孙固此言一出如雷轰顶，对宋襄公心理的冲击势必较大。然其仍坚持一战，并在泓之战中试图以“礼”号召中原诸国，共同面对强楚，行复商之大业，亦可谓知其不可为而为之！从这里看同为殷商后人的孔子，其为理想献身的精神似与宋襄公如出一辙。而如果完全依《史记·宋微子世家》所言谏者皆为子鱼的话，那么，泓之战前后宋襄公的处境及心态，在后人看来将会黯然失色不少。

总之，考证谏者为公孙固和子鱼者，可能既与史实不符，读来境界亦完全不同。尽管关于此时宋襄公的心理状态，各类史书

^① 李学勤主编：《十三经注疏·春秋左传正义》，第397页。